

列 寧 著

現時和社會主義
完全勝利後金子底作用



В. И. ЛЕНИН

О ЗНАЧЕНИИ ЗОЛОТА ТЕПЕРЬ И
ПОСЛЕ ПОЛНОЙ ПОБЕДЫ СОЦИАЛИЗМА

本書是按莫斯科外國文書總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中文版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中的現時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金子底作用一文排印的。

把注意力集中到還沒有解決的革命任務上，——這是慶祝偉大革命紀念日的最好辦法。現在當還存在有革命尚未解決的一些根本問題，並需要去通曉某種新的東西（從迄今以前這革命中已做到的一切看來），以便解決這些任務的時候，這樣來慶祝革命，乃是特別適當和特別必要的。

對於我國革命說來，現時的新東西，就是在經濟建設底根本問題上，必須採用「改良」的、逐漸的、審慎迂迴的行動辦法。這件「新奇事情」，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引起許多問題和許多誤解。

理論上的問題是：在整個革命全盤勝利進程的條件下，在實行了許多最革命行動的同一場所，却轉而採取非常「改良」的行動，這種轉變又怎樣來解釋呢？這裏是否有「放棄陣地」、「承認破產」等類的事情呢？我們的敵人，自半封建式的反革命派起直至

孟什維克或第二半國際底其他英雄們止，當然都說是有的。正因為他們是敵人，所以就不管有沒有理由，總在大聲疾呼地這樣聲明。從封建派直到孟什維克止的一切政黨在這個問題上很動人的統一，只是又一次證明所有這些政黨真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羣反動派」（順便說說，正如一八七五年和一八八四年恩格斯致伯伯爾的信中所預見到的一樣）。

但在友人中，也有某種……「誤解」之處。

我們要恢復大工業，並調整大工業與小農業間的產品交換，幫助小農業走向社會化。爲了恢復大工業，我們用餘糧收集制的辦法，從農民那裏借來某種定量的糧食與原料。這就是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春以前那三年多內所實行過的計劃（方法和制度）。這在直接與徹底摧毀舊社會經濟結構而代之以新社會經濟結構的意義上說來，曾經是解決任務的一個革命辦法。

自一九二一年春以來，我們却實行着完全是另一種的，改良式的辦法（尙不是「已實行了」，而只還是「正在實行着」，並且對這點我們還沒有充分悟解到）以代替原先所實行的辦法、計劃、方法或制度。所謂改良式的，就是說：並非摧毀舊社會經濟結構，

即商業、小經濟、小營業、資本主義，而是振興商業、小營業和資本主義，審慎而逐漸地來把握它們，或者說，只是按它們振興的程度，使之有可能由國家來加以調劑。

這完全是解決任務的另一種辦法。

比較原先革命的辦法說來，這乃是改良的辦法（革命就是最基本地、最根本本地摧毀舊事物的改造手段，而不是力求把它摧毀得儘量少，不是審慎地、緩慢地、逐漸地來改造它）。

於是有人問道：既然你們試行過革命方法，認為這種方法無效，轉而採用改良方法，這豈不是證明你們一般地宣佈革命是錯誤麼？這豈不是證明本來一般地就不應該先從事革命，而應該先從事改良，並祇限於改良麼？

孟什維克及其同流們所作出的結論，便是如此。但這種結論，或者是那班經過政治「火焰」鍛鍊的人底詭辯和簡單的騙詐行為，或者是「未經」真正考驗的人底幼稚言論。對於一個真正革命家說來，最大的危險，——也許，甚至是唯一無二的危險，——就是革命誇大狂，忘却革命方法之適當運用與順利運用的界限和條件。真正的革命家，假使一開始就大書特書「革命」，而把「革命」抬高到幾乎是神妙而不可攀的東西，但却

毫無頭腦，毫無能力去最冷靜地、最清醒地想像、估量和檢查：究竟在什麼時機，什麼環境，什麼活動領域內，應該善於按革命方式來行動，而在什麼時機，什麼環境，什麼活動領域內，應該善於轉為改良的行動，那麼，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就最易於一敗塗地。真正的革命家，若是他們失去清醒頭腦，一心設想彷彿「偉大的、勝利的、世界的」革命在任何行動領域的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而且必須按革命方式來解決任何任務，那他們就會遭到滅亡（並非指他們外表上的失敗，而是指他們事業內部的破產），——且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必定遭到滅亡。

誰要是這樣「設想」，誰就必遭滅亡，因為他在根本問題上所設想的純係蠢事，而在殘酷戰爭（革命是最殘酷的戰爭）期間，對蠢事的懲罰，往往就是失敗。

根據什麼能得出結論，說「偉大的、勝利的、世界的」革命所以採用和必須採用的方法，只能是革命方法呢？這種結論是毫無根據的。並且這一結論簡直無條件地是錯誤的。如果不離開馬克思主義立場，從純粹理論原則上說來，這種結論顯然是不正確。我國革命的經驗也證實了這種結論是錯誤的。在理論上：恩格斯說，革命期間，亦如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能作出蠢事來的，他的這句話乃是真理。應該極力少作蠢事，對已



繩作過的蠢事，要儘快加以糾正，要儘量清醒地估計到，在什麼時候，哪些任務可以用革命方法去解決，哪些任務却不能用革命方法去解決。我們有過親身的經驗：布列斯特和約，完全不是革命行動底標本例子，而是改良行動，甚至比改良行動更壞的一種行動底標本例子，因為這是開倒車；至於改良的行動，照例乃是緩慢地、審慎地、逐漸地前進，但不是開倒車。在締結布列斯特和約時我們策略的正確性，現在已全被證實，已爲人所公認共曉，因而對於這個問題，完全沒有再提的必要。

我們所充分做到了的，僅僅是我國革命中關於資產階級民主方面的工作。而我們十二萬分有權來以此自豪。這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或社會主義的工作，歸結起來有以下主要三種：（一）用革命手段擺脫了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揭破並拆垮了資本主義世界兩大強盜集團底屠殺；這點在我們這方面，是充分做到了的，但要在各方面把這點徹底做到，那就只有靠幾個先進國家內的革命。（二）建立了蘇維埃制度，亦即建立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世界的轉變業已告成。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制時代業已終結。全世界歷史底新篇幅，即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開始了。只是要由其他許多國家來完善和完成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底一切形式。在這方面，我們所尚未作成的事，還非常之多。如

果不看清這點，那便是不能饒恕的。我們還要多次地來完善、改造和從頭做起。今後在發展生產力與文化的事業上，我們所能前進與上升的每一梯級，都應當與完善和改造我們蘇維埃制度這點，並駕齊驅；而我們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却還落後得很。尙待改造的事情還非常之多，如果以此「赧顏自慚」，那就妄誕至極（甚至比妄誕更壞）了。（三）社會主義制度基礎底經濟建設。在這方面，最主要和最根本的事還沒有做到。而這也就是我們最可靠的事業，無論從原則觀點或實踐觀點看來，亦無論從現在蘇俄的觀點或國際的觀點看來，都是最可靠的事業。

既然，最主要的事在基本上還沒有完成，那麼全部注意力就應當放在這方面。這裏，困難的地方也就在於過渡底形式。

我在一九一八年四月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一文上，曾這樣寫道：「僅僅一般地做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鍊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這個環節是爲了把握住整個鍊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同時，在事變發展的歷史鍊條裏，各個環節的次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關連，它們彼此間的區別，都不像鐵匠所製成的普通鍊條那樣簡單，那樣笨

抽」。

目前在我們所說的活動上，這樣的環節就是要振興國內商業，而由國家加以正確的調節（指導）。商業便是在歷史事件鍊條中，即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過渡形式中，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我們居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環節」。如果我們現在把這一環節「抓住」得充分牢固，那麼在最近將來，所有整個鍊條，我們就定能把握住。否則我們既抓不住整個鍊條，而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基礎，也就無從建立了。

表面上看來，這好像是很奇怪的。共產主義和商業？！彷彿這兩者乃是什麼極不適當，格格不入、相距遙遠的事物。但如果從經濟上深思一下，則這兩者間的距離，並不比共產主義與小農經濟和宗法農業的距離更遠。

當我們將來在世界範圍內勝利了的時候，我想，我們會在世界幾個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築成一些公共廁所。這樣使用金子，對於這些後代人說來，乃是最「公平」而最有教益的辦法，因為他們還沒有忘記，正是爲了金子的緣故，曾於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偉大解放」戰爭中，亦即在爲了解決這個大問題——是布列斯特和約壞些，還

是凡爾賽和約壞些的戰爭中，竟使一千萬人犧牲，三千萬人殘廢；也正是爲了這金子的緣故，或則於一九二五年前後，或則於一九二八年前後，不是在日美戰爭，就是在英美戰爭，或總之是在此類戰爭中，定會再使二千萬人犧牲，再使六千萬人殘廢的。

姑無論上述這種使用金子的辦法，是如何「公平」，如何有益，如何合乎人道，但我們總歸要說：爲要做到這點，還應當像我們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工作中那樣緊張，那樣有成效地，再操作一二十年吧，不過規模還要更加宏大。而現時在蘇俄共和國內，總還是應當愛惜金子；賣出金子時，金子要賣得貴些，用金子買進商品時，商品要買得便宜些。既是同狼處在一塊，就應當做照狼的辦法，至於說到要滅絕所有的狼，如像在合理的人類社會裏所必需的那樣，那我們就得記住俄國這樣的一句聰明俗話：「上戰場別吹，下戰場再吹吧」……

假如……假如千百萬小農旁邊，沒有電綫密佈的雄大機器工業，即無論按其技術強力和有組織的「上層建築」以及與之伴隨着的現象說來，都是能於用大量優良產品，並較前更加便宜更加迅速來供給小農的這工業，那麼，在此種情形下，商業就是千百萬小農與大工業之間唯一可能的經濟聯繫。在世界範圍內，這「假如」二字業已實現，這個

條件已經存在，可是一個國家，並且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最落後的國家之一，曾在實踐上試圖把工業與農業間這種新聯繫立刻而直接地實現，執行與安排就緒，但它既是未能用「衝擊」動作，一舉解決這個任務，所以現在，它就應當用多次緩慢的、逐漸的、審慎的「包圍」動作來解決這個任務。

把握商業，指導商業，把商業放在一定的範圍內，這是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所能做到的事。試舉一個極小的例子來說：在頓巴斯，一部分由於提高國營各大礦井的勞動生產率，一部分也由於把小的農民礦井出租，便已開始了不大的、很不大的、但無疑是實在的經濟復興。因此，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得着數量不多的（從先進國家底觀點看來，乃是微末不堪的，然而在我國貧困現象之下却終歸是彰明較著的）補充煤炭，如把煤的成本作為百分之百，國家就根據這成本比例，按百分之一百二十賣給國家機關，而按百分之一百四十賣給私人使用。（我要附帶聲明一句，這些數目字，完全是我隨意想出的，一則因為我不知道確切數字，二則因為我即令知道的話，那我此刻也不會來公佈這些數字）。這好像說，雖然規模很小，但我們已開始把握工農業間的周轉，把握批發商業，把握這樣的任務：抓緊着現有小的、落後的工業，或者是大的、被削弱了被破壞了的工業，在

當前經濟基礎上把商業復活起來，使中等的、普通的農民（這是農民大眾，是農民羣衆底代表者，是自發勢力底體現人）能感覺到經濟上的復興，然後利用這樣的機會，更有系統地、更倔強地、更廣泛與更順利地來恢復大工業。

我們決不致於受「情感社會主義」或舊俄國式、半老爺式、半農民式、宗法式等情緒所支配，它們的特性是任意漠視商業。既然要鞏固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繫，要在一個破產遭難的國家來刻不容緩地活躍國民經濟，要振興工業，要便於今後實施更深廣的辦法如電氣化等，那麼所有一切經濟上的過渡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善於利用。

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但馬克思當時只能從一方面，即是只能在無產階級甚至在一個國家中都還沒有獲得多少穩固、多少長久的初次勝利的環境裏看見這種關係。在這樣的環境裏，正確關係底基礎，就是把改良看成無產階級所作革命階級鬥爭底副產品。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說來，這一關係乃是無產階級革命策略底基石，是無產階級革命策略底ABC，而第二國際底變節領袖以及第二半國際半迂腐、半狡猾的英雄們却總在曲解與蒙蔽這ABC。當無產階級即令只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時，於是在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上便有一種新東西出現了。在原則上，

事情仍如以前一樣，但在形式上却已有一個爲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察到的變化；可是這個變化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與政治觀點，才能了解。爲什麼我們能正確運用布列斯特的退守呢？因爲我們前進得如此之遠，我們也就有退却的地方。我們以這樣驚人的速度，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到布列斯特和約時止，在若干個星期之內，就建成了蘇維埃國家，用革命辦法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甚至就是這一大規模的背進運動（布列斯特和約），也總歸使我們保持了充分廣闊的陣地，以便能利用「暫息」時機，然後勝利前進去反對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皮爾蘇茨基、弗蘭格爾。

當無產階級尚未勝利以前，改良是革命階級鬥爭底副產品。而在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之後，對於獲得了勝利的國家說來，當實力會因極度緊張運用而弄得顯然不够去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時，改良（雖在國際範圍內仍舊是「副產品」）還是爲取得暫息時間所必要的和理所當然的手段。勝利給予了很多的「後備力量」，使我們甚至在被迫退却時，也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所謂在物質方面支持下去，——這就是說，保持住力量上的充分優勢，而使敵人

不能把我們徹底打垮。所謂在精神方面支持下去，——這就是說，不使自己精神渙散和組織瓦解，却保持住對情況的明確估計，保持住勇敢與堅毅精神，即令就退却得很遠，但只是退却到一定限度，以便能及時停止退却，並重新轉為進攻。

我們已向國家資本主義退却了。但我們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現時我們正在向由國家來調劑商業這方面退却。但我們也會是退却得有限度的。現在業已有了這樣的徵候，可以望見這一退却的終點，可以望見，就在並非遙遠的將來，我們能於停止這一退却。我們進行這次必要的退却愈是自覺，愈是步調一致，愈是少帶成見，則愈能迅速地停止這一退却，爾後我們勝利前進，就會愈加穩固，愈加快便，愈加遠大。

尼·列寧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刊載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兩日真理報第二百五十七號